

【研究論著】 General Article

中國近代武士道理念的檢討

A Discussion of the Idea of the Warrior Way in Modern China

蔡振豐
Chen-Feng TSAI*

關鍵詞：武士道、中國之武士道、精武體育會、梁啟超、楊度

Keywords: bushido, Chinese way of the warrior, Chin Woo Athletic Association, Liang Qichao, Yang Du

*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摘要

一九〇四年梁啟超(1873-1929)曾在上海廣智書局以「飲冰室主人」之名出版《中國之武士道》一書。此書以日本尚武而國勢日強，中國不武而衰亡為其基本邏輯，希望重新喚起中國人尚武的民族天性，以使中國趨於富強。本文旨在檢討梁啟超「中國之武士道」理念的影響及成敗。本文的結論以為：中國不具備類似日本武士道的文化條件，又有戀生享樂的楊朱思想為其底層文化，因此梁啟超之橫移日本的武士道，在中國最後僅形成「體育強種」及「恢復尚武天性以競爭於列強」之論說而已，不能真正達成改造國民性格的目的。

Abstract

In 1904 Liang Qichao (梁啟超, 1873-1929) published *The Chinese Warrior Way* in which he argued that Japan had become a strong country because it gave prominence to the role of the warrior, while China had grown weak because it did not. To rectify that situation, Liang expressed his hope to awaken the warrior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us see the country on the road to strength and prosperity. In this paper, we review the influence and impact of Liang's idea of the "Chinese warrior way." We conclude that China does not have the cultural conditions like those found in Japan that gave rise to the notion of bushido (武士道). Furthermore, we note that since the love of life and pleasure associated with the thought of Yang Zhu (楊朱)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ultural substratum, Liang's attempts to import the Japanese idea of bushido ultimately did not result in strengthening the nation as he had hoped. At most, it resulted in the alternate discourses of "strengthening the race through exercise" and "restoring a warrior spirit to compete with European nations."

壹、武士道與國民精神之改革

日本近代武士道概念的產生與國族意識型態有密切的關係，¹這可由一八八二年一月四日由明治天皇（1852-1912）所頒布的〈軍人勅諭〉（陸海軍軍人に賜はりたる勅諭）中看出，〈軍人勅諭〉明確地以武士道中的五個支柱：忠節、禮儀、武勇、信義、素質做為國民軍人的根本，可說正式的將武士道帶入國家的教育體制中。日本武士道精神受到國際的注目，始於一八九九年（明治三十二年）新渡戶稻造（1862-1933）在美國出版《武士道》一書（*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日文版在1900年發行），之後也有井上哲次郎（1855-1944）和有馬祐政（1873-1931）共同編寫《武士道叢書》三冊，於一九〇五年在東京博文館出版。由於新渡戶稻造《武士道》強調：「日本人把忠（Loyalty）放在人倫各種道德的最高位置」、「國家的存在先於個人，若遇到忠孝難以兩全時，日本武士會選擇盡忠」，因而之後的論者無不認為一九〇四年日本在日俄戰爭的勝利與其後軍國主義的發展，皆是武士道精神的延伸，而將武士道視為日本崛起的精神支柱。

二次大戰後，武士道的再度顯題化是在二〇〇〇年之後。二〇〇三年，中華民國的前總統李登輝（1923-）在日本小學館出版《武士道解題：ノーブレス・オブリージュとは》；同時，由愛德華史威克（Edward Zwick）導演，湯姆克魯斯（Tom Cruise）、渡邊謙主演的電影「末代武士」（*The Last Samurai*）也公開上映。二者所掀起的風潮使得新渡戶稻造的古典名著《武士道》和二〇〇五年由新潮社出版之藤原正彥（1943-）的

1 意識型態具有下列特性：（一）系統性：是一套價值信念，同時也包含實踐系統。（二）排他性：對內有統整性，對外有排他性。（三）強制性：為維持體制的穩定與強化團體意識，因此對成員有規範性。（四）情感性：其產生具有情感的性質。（五）主導性：以行動為導向，希望團體的目標可以達成。近代武士道精神所含蘊的觀念皆與上述特性有相合之處，故可視為國族意識型態。有關意識型態之特性，參見陳伯璋：《意識型態與教育》（臺北：師大書苑，1993年），頁4-5。

《國家の品格》在日本成了暢銷書。²基於武士道與軍國主義的聯想，武士道議題的再受重視，難免令其他亞洲國家存有軍國主義復辟的疑慮。

李登輝在二十一世紀重論武士道，與其有意喚回或改革國民的精神有關。³這本書的副標題「做人的根本」，對於日本人及臺灣人各有不同的意義。在對日方面，李登輝批評日本在九〇年代末期的經濟衰退，與多數官僚不敢負責的可恥行為有關，他要求日本這一長期主張和平的經濟大國要振奮其大和精神，在國際社會上扮演重要的角色。⁴在對臺方面，李登輝除了宣稱：「對於總統任內十二年的奮鬥，我自詡確實能一貫始終地朝理想奮鬥前進，內心最大的支柱，就是早年日本教育打下的『大和魂』精神，也就是『武士道』精神」之外，也在〈後記〉中提到：「因為各種複雜的因素，不只我個人，臺灣這個國家也有許多苦惱、悲哀。但也因有苦惱及困境，臺灣人更須以最大的勇氣與毅力突破重圍。臺灣人必須問自己，自我認同在那裡？如何才能安身立命？〔……〕臺灣人要有前途，必須發揮特有的慈悲與寬容的性格才行。臺灣人有必要發展高尚的人格與行為，培養出類似日本人武士道的卓越精神」。

李登輝的論點雖然在臺灣引起正、反兩面的意見，⁵但類似的想法在中國近代也曾被實踐過，如維新變法失敗後流亡日本的梁啟超（1873-

2 《國家の品格》上架一百九十天即有二百萬本的銷售量，本書原版封面寫著：「劃時代的日本論，賜給所有日本人驕傲與自信」，並且呼籲：「勿被全球化浪潮淹沒，應爭回日本的國格」。其商業廣告，摘要全書的內容言：「日本人隨著國際化以及全球化的曲調起舞而忘掉了自己國家的風格。其實國際化、全球化都是美國化的代名詞。一味追求『邏輯』以及『理性』所進行的『改革』，無法防止社會的荒廢。現今日本所需要的是『情緒』勝於『邏輯』、『國語』勝於『英語』、『武士道精神』勝過『民主主義』，藉這些來恢復國家的品格」。

3 附於本書中的推薦辭中，有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話，他說：「大部分日本人都冷淡旁觀自己的國家一路衰退，幸有臺灣的李登輝前總統懇誠告誡，日本人切需警惕奮發呀！」

4 根據李登輝的說法，日本人所以失去其大和精神，與二次大戰日本戰敗時否定武士道有關，他說：「當1945年8月15日，日皇廣播日本向盟軍無條件投降之後，瞬間，站在教育第一線的教師和左派所控制的輿論，馬上全盤否定日本人應有的『忠、義』。在我看來，其實是對『武士道』的誤解，而且在一夕之間，做了最徹底的背叛」、「近年來日本相繼爆發少年殺人事件，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個人與國家、社會失去了緊密的聯繫。孩子們喪失了自我認同，因而徬徨不安，行為失措」。

5 以臺灣為例，《海峽評論》第168期（臺北：海峽評論雜誌社，2004年12月）即有阿修伯

1929），即曾於光緒三十年（1904）在上海廣智書局以「飲冰室主人」之名出版《中國之武士道》一書。⁶《中國之武士道》明顯即是向東洋取經的著作，以日本尚武而國勢日強，中國不武而衰亡為其基本邏輯，故在〈自敘〉中言：

泰西、日本人常言，中國之歷史，不武之歷史也；中國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嗚呼！吾恥其言，吾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

中國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中國民族之不武，則第二之天性也。此第二天性誰造之？曰時勢造之、地勢造之，人力造之〔……〕今者民智程度漸脫離天造草昧之域而時勢蓋一變矣。合五大洲為一大戰國而地勢蓋又一變矣，所未變者人事而已。西哲有言：凡可以以人力破壞之物，必還可以以人力恢復之。夫我族之不武，其第二天性耳，若夫最初之天性，則今存諸族，度未有能出吾右者，此歷史所以明以告吾儕也。〔……〕吾故今蒐集我祖宗經歷之事實，貽最名譽之模範於我子孫者，敘述始末而加以論評，取日本輸入通行之詞，名之曰：中國之武士道，以補精神教育之一缺點云爾。⁷

由上引梁啟超的言論，可見其主要的想法在於藉《中國之武士道》之編寫，作為精神教育教材，用以革新國民的思想、喚起尚武的民族天性。

（劉德安）：〈慶祝終戰武士道復興在臺灣〉及王美琇：〈遇見李登輝的「武士道」〉二篇對於李登輝《武士道解題》的評論。前者認為：「日本武士道精神軍國主義就與德國納粹和義大利法西斯一樣是危害全人類的惡魔災星。要向全世界宣示，喚起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包括有理性良知的日本人，共同來警惕防止災劫！」後者附和李登輝的觀點，認為：「李登輝先生曾倡導的『心靈改革』，個人覺得如果沒有從國民教育徹底改造，我們整體國民的素質不可能提升，社會要向上提升，恐怕是緣木求魚。」

6 書名曰「中國之武士道」，作者在〈凡例〉中言：「武士道者，日本名詞，日人所自稱大和魂，即此物也，以其名雅馴，且含義甚淵浩，故用之。」本文所據為一九五七年臺灣中華書局印行本。

7 見梁啟超：《中國之武士道》（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57年），頁17-23。

《中國之武士道》促使中國人重新考慮尚武與國民精神之間的關係，故在此書之後，類似的意見亦時而可見，如《清續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一〈學校考十八〉記載陸軍大臣蔭昌（1859-1928）等奏，請飭明訂軍國民教育，⁸其理由即是：「東西列邦立國多用軍國主義，德以軍國民政策雄視歐西，日本以武士道訓其國人稱霸東亞，其餘各國皆以重兵尚武列為學堂普通科學，是故國民勇健、奮發早，養成其英銳不屈之精神」。可見在民國前後，借鑒於日本武士道而圖喚起中國尚武精神的理念，幾乎是中國救存圖強的重要方策。

貳、民國前後中、日武術團體在「武士道」上的表現

梁啟超提出「中國之武士道」概念後，是否產生具體活動上的影響？這可由武術團體的成立及武德精神的淬煉二方面進行檢討。就前者而言，梁啟超的努力確實引發了「強國強種」、「體育救國」的種種反應，但於革新國民精神上並不見顯著的影響，這可由比較民國前後中、日兩國體育團體之活動略見其梗概。

以中國在一九一〇年創立於上海的「精武體操會」（1916年改名為「精武體育會」制定會章、會徽、會訓）而言，⁹此會提倡「大精武主義」。「精」是指消除中華武術的門戶之見，以科學之精神探求「體育之真理」；¹⁰「大」是指體育之精神在於融貫「儒之克己、佛之平等、耶之博

8 蔭昌於一九〇九年任陸軍部大臣、軍諮府大臣等職，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爆發，故此事應在一九〇九與一九一一年之間。

9 「體操」之名應是延用日本人之用詞。明治二十三年（1890）由海江田信義所成立的「日本體育會」便是專門研究劍道等武道活動的單位。甲午戰爭之後，為了將武道精神推廣於教育體系中，便有以體操之名而行劍術、柔術教育的「擊劍體操法」、「武術體操法」等名稱出現，如明治二十九年橋本新太郎著有〈新案擊劍體操法〉、明治三十年小澤卯之助著有〈新式武術體操法〉。以上，可參見高野佐三郎、高野弘正：《小學劍道指導書》（東京、大阪：東洋圖書，1937年），頁245-246；渡邊一郎（編）：《史料明治武道史》（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71年3月），頁345-364、367-483。

10 陳鐵生〈大精武主義〉言：「體育之途夥矣，說者謂器械徒手歐法具備，苟能有是，則已無復遺憾。然窮其成法，多囿於一技，每有顧彼失此之慮。求其四體百骸協同動作、氣血共長者，初無有焉；有之，其惟吾華數千年遺傳絕續之技擊術是已。技擊之作用最

愛」等三教精神。¹¹精武體育會雖有所謂「大精武主義」而以「克己、平等、博愛」為其精神，然並無深切的理論及教育之實踐為其基礎，故只能以「平等康健」為其立會之宗旨；在「文事部」中也僅有實用性的國文、英文、簿記學、打字、書法、圖畫、攝影、華醫、西醫、普通語等教習。¹²再以一九一八年在上海成立的「中華武術會」為例，¹³該會於所辦《武術月刊》之發刊辭中揭示體育救國之說，然僅設「專門武術」、「普通武術」二科，¹⁴月刊第一期所刊載小說，開頭即有：「仗義多從屠狗輩，負心最是讀書人」之語，¹⁵於此皆可見於文化教育一事無所措意。

對照中國武術團體與日本武德會的成立章程，可以發現中國武術團體的組織規章在精神教育上的缺乏。¹⁶日本明治八年（1875）的廢刀令及秩祿

神，漢時華陀用以治病，然體育真理猶未發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海通以後，知歐美之強盛道在體育，故彼之種種運動乃稗販於吾華焉。」見氏著：《精武本紀》，收入釋永信（編）《民國國術期刊文獻集成》（北京：中國書店，2008年），第1卷，總頁25。

- 11 陳公哲〈精武之真精神〉言：「精神必依附於形式，而形式要不足以眩精神，以精武體育會言之，日習技擊此形式也，非精神也。精神之在無方體，雖會中人不知其所以，是蓋與山行者不自知其位置之高、舟居者不自知其進行之速同一理也。昔孔子之稱虞舜曰：蕩蕩乎民無能名；頌泰伯曰：民無德而稱。精武之所以為精武者，亦若是焉已矣。然則終無以名之乎是又不然。精神之所在，固無名稱可言，而要非不可告人者。公哲不敏，謹舉平日所身歷所目擊者，略述其梗概。夫儒之宗旨為克己；佛之宗旨為平等；耶之宗旨為博愛。克己也、平等也、博愛也，儒佛耶之真精神也，今以觀於精武會員，實能融會貫通無可駁。」見《精武本紀》，收入釋永信（編）《民國國術期刊文獻集成》，第1卷，總頁29。
- 12 此會設有「技擊部」、「兵操部」、「文事部」、「遊藝部」等，見《精武本紀》，收入釋永信（編）《民國國術期刊文獻集成》，第1卷，總頁26-27。
- 13 此會由吳志青、唐新兩、戈公振、黃警頑等發起，於一九一八年二月成立。初稱「中華武俠會」，提倡德、智、體、美四育。一九一九年八月，改名「上海武術會」，十二月改稱「中華武術會」。
- 14 見《武術月刊》，第1卷第1期，收入釋永信（編）《民國國術期刊文獻集成》，第1卷，總頁381-387。
- 15 見《武術月刊·小說·兵毒》，收入釋永信（編）《民國國術期刊文獻集成》，第1卷，總頁367。
- 16 有關武德會的相關研究可參見渡邊一郎（編）：《史料明治武道史》、入江康平等（著）：《日本武道學研究：渡邊一郎教授退官記念論集》（東京：島津書房，1988年）、中村民雄：《史料近代劍道史》（東京：島津書房，1985年）、財團法人全日本劍道連盟：《劍道の歴史》（東京：朝日新聞出版，2003年）、財團法人全日本劍道連盟：《五十年史》（東京：サトウ印書館，2003年）、井上俊：《武道の誕生》（東京：吉川弘文館，2004年）及陳義隆：《日治時期臺灣武道活動之研究》（中壢：中央

處分雖然對武人形成嚴重的打擊，但由於「西南戰爭」（1877）中修習劍術的警視廳會津拔刀隊在戰役中的活躍，¹⁷以及日俄戰爭時所顯示白兵戰的重要性，使得日本舊有的柔、劍之術再度受到重視，因而有「大日本武德會」之成立。¹⁸明治二十八年（1895）二月十日，京都府收稅長鳥海弘毅與丹羽圭介、佐佐熊太郎三人，為使武術教育產生精神鍛鍊之效，因而組織相關的武術團體，於四月三日在河原町的共樂館成立「大日本武德會」，同月十七日由京都府知事渡邊千秋擔任會長，設立總會，並訂立趣旨與規則如下：¹⁹

武德會起源及旨趣：

本會創立於明治二十八年四月。時值日清戰役結束之際，擔心我國的地位，憂慮國家前途而倍感心寒。為了振興維新以來瀕臨廢絕的武道、國民的武德涵養，提振我國之精華——武士道的計劃已是迫在眉睫之務，期望能以一片微薄的衷心報效國家。在此創立大日本武德會作為獎勵此道的機關。

武德會成立之事業目標：

1. 平安神宮範圍之武德殿的保存經營。
2. 每年舉辦武德祭與大演武會。
3. 學校演武場與其他教育機關之設置。
4. 武德修養與武道優良者之表揚、優待事項。

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等。

- 17 西南戰爭主為明治維新政府對薩摩藩西鄉隆盛（1828-1877）旗下的「私學校」與板垣退助（1837-1919）的「立志社」二大反政府勢力的討伐戰爭，雙方激戰達八月之久。此役，西鄉隆盛的戰敗不但代表中下武士的反抗勢力滅亡，也代表「倒幕派」政治生命的結束。此可參見林明德：《日本史》（臺北：三民書局，1986年10月初版），頁262-263。
- 18 有關日本武德會之成立，《臺灣日日新報》有如下的敘述：「自明治之初年。至西南戰爭時。全為歐化之世。雖無更唱尚武者。然是役有拔刀隊之組織。始知武之必要。至爾來略知尚武的氣象之養成，為必不可無。會日清戰爭。益悟武道隆興之必要。我武德會即於此時而生。年年以五月四日。盛開大會者。不外以桓武天皇之禦代。行武德祭之日為紀念。」見〈臺南之招待武德會長〉，《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6月4日。
- 19 見渡邊一郎：《武道論》（東京：筑波大學體育學系，1981年），頁1-2。

5. 在武德殿附近建造武庫、蒐集武器事項。
6. 古武術的保存。
7. 武德、武術、武器相關史籍的編纂，與武德會會誌之發行事項。

由上列的旨趣與事業目標，可知武德會成立的目的在於「振興武道」、「涵養國民武德」、「提振武士道精神」，而其在文化上的實際作為則有「武德修養與武道優良者之表揚、優待」、「武德、武術、武器相關史籍的編纂」等活動，這些活動皆為中國武術團體所未有。

由上述的事實可知，日本武術團體在精神教育上，早有江戶時期的武士倫理可供依循，故不需重新建立所謂的「武士道」或「武德」，而只需訂出一套辦法，即可對武德修養與武道優良者進行表揚與優待。相對而言，中國因為沒有居於統治者的武士階級，也未形成武士的規範之道，因之若要追究習武者之規範，則僅能由遊俠故事建立。然而，由於遊俠之流，其作為不必然涉及於國族之事，故梁啟超乃欲藉《中國之武士道》一書，探討民族之尚武精神，並依此激發國民的愛國情操。

從結果上看，梁啟超的努力並未成功，其根本的原因可能在於政治力量的不足；《中國之武士道》雖是為高等小學及中學所編寫的教材，²⁰然此書並未得到執政者的大力推廣，也未列入教育體制而成為教科書，因而其所欲喚起的尚武精神並不能深入全國各地。

相較之下，日本武德會在明治二十八年（1895）五月二十八日推舉當時的國民英雄陸軍參謀總長小松宮彰仁親王作為總裁，之後相繼入會者有西鄉從道（海軍大臣）、渡邊國武（通信大臣）、伊藤博文（內閣總理大臣）、山縣有朋（曾任樞密院議長、甲午戰爭日本第一軍司令官）、大山

20 《中國之武士道·凡例》言：「興味為教育兒童之要件，本編所採事實，皆最有興味，能刺激人腦識者，故以充高等小學及中學之教科最宜。」「近來新智識輸入，教育必要之條件既繁多，故國文一科反致欠缺，僅以識字綴句而已，其餘新出諸籍，又皆間雜譯語，詰鞠為病，祖國高等國文之精神遂將失墜。本編所采皆先秦名文，教者宜擇其中長篇，授學徒口誦以啟其文學天才，勝於讀詞勝理疏之八家文也。」（頁1-2）

巖（陸軍大臣、同第二軍司令官）、松方正義（大藏大臣）、土方久良（宮內大臣）、東久世通禧（樞密院副議長）、榎本武揚（農商務大臣）、芳川顯正（司法大臣）、野村靖（內務大臣）、川上操六（陸軍參謀次長）、伊東祐亨（聯合艦隊司令長官）等。²¹這使得武德會逐漸蛻變成政府的外圍組織，而成為可深入各州郡的全國性組織。

在中國，武術教育進入國民政府的組織架構為時甚晚，一直到一九二八年，南京政府才在行政院之下，設立了「中央國術館」。²²中央國術館雖以「傳承中國武術，提升國民健康，以國術救國，整理武術資料，建立全國國術館體系」為其成立宗旨，也在一九二八、一九三三年舉辦過兩次全國國術考試，²³但由於當時的教育部並無意將中央國術館納入其教育體系，且開館不久其內部即爆發門戶之爭，因此在武德及武術上的推廣均不理想。²⁴由此可見中國因缺乏武士之道的文化傳統，以致在接續及開展上皆有困難，更遑論由此而進行國民精神之改革。

-
- 21 見中村民雄：〈大日本武德會設立過程の研究——組織の形成と財政基盤について〉，收入江康平等（著）《日本武道學研究：渡邊一郎教授退官記念論集》，頁409-410。
- 22 在張之江的積極奔走下，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國民政府公報》第四十一期刊載第一七四號公文，批准備案成立「中央國術館」，其全銜為「國民政府直屬國立南京中央國術館」，簡稱：「國術館」或是「央館」。中央國術館由國民政府行政院直接管轄與推行，訂有《中央國術館組織大綱》、《省、市國術館組織大綱》、《縣國術館組織大綱》、《國術國考條例》等法規，國術一名的訂定亦由此開始。有關中央國術館之相關研究可參考昌滄：〈南京中央國術館始末〉，《體育文史》，第4、5期（北京：國家體育總局文史工作委員會，1997年），頁38-40。
- 23 國術國考之考科分：一、預試（套路演練）；二、正試（雙人對打，不分級別與體重，採三戰兩勝制；試科有拳腳門、摔角門、刀劍門、棍槍門、搏擊等）；三、口試（三民主義）。國考前三名稱號：「國士」、「俠士」、「武士」。
- 24 中央國術館開館後在組織架構上分「少林」與「武當」二門，一九二八年底「少林」與「武當」二門之門長、科長相互衝突，造成副館長李景林、少林門門長王子平離職，隨即改組。一九二九年改組後，張之江館長取消門派制度，改以「教務處」執行教學工作，設有教務、編審、總務三處。

參、近代中國傳統習武者的規範之道

「武道」與「武士道」在日本有不同的意義。簡言之，武士作戰的技巧、武技屬於「武道」範疇；²⁵而在精神修練與行為規範上，則統稱為「武士道」。²⁶「武道」日本早期稱之為「武術」，²⁷在中國則多稱為「武藝」。「武士道」起源於日本封建制度的「武士」（Bu-shi）²⁸階級。日本在室町（1336-1392）、戰國時期（1467-1603）的武士之道稱為「侍道」、「武者道」、「武道」、「武邊道」等。江戶時代（1603-1867）的武士道德則以中國傳來的儒教倫理為中心，而有「武士道」、「士道」的觀念，武士因此而被型塑為儒教下的「士君子」，必須遵從「五倫、五常」且以「天下為己任」，這使得武士在精神方面的修練逐漸增加而有「文武兼備」的素質。²⁹

25 「武道」意為軍事上以及武術相關之道。參見諸橋徹次（編）：《大漢和辭典》（東京：大修館，1960年），卷4，頁697。近代「武道」所指，大多指施行於「員警系統」與「學生教育」為中心之「劍道」、「柔道」、「弓道」、「薙刀」等。若論日本之「古武道」則範圍極廣，包含劍術、柔術、弓術、空手、拳法、捕手、相撲、馬術、刀、槍、砲術、忍術、水泳、棒術、杖術、鎖鎌、手裡劍，以及軍陣、兵法（戰術）等。

26 「武士道」為武士遵守之道，其主要的要素為忠、孝、勇、名譽、禮義、信義、廉潔、質素、慈愛等。參見諸橋徹次（編）：《大漢和辭典》，卷4，頁697。新渡戶稻造言：「日文裡的武士道（Bu-shi-do）字面的意思是打仗騎士的方法，也就是貴族武士在日常生活與職業上應該注意的事項，簡單地說，就是武士的戒律，所謂武士階級的高尚義務。」見新渡戶稻造：《武士道：影響日本最深的力量》，吳容宸（譯）（臺北：先覺出版社，2003年），頁10-11。

27 如「劍道」、「柔道」、「弓道」早期以「柔術」、「劍術」、「弓術」稱之。最先提出「柔道」概念者，為創立「講道館」的嘉納治五郎（1860-1938）。大正三年（1914）時警視廳總監西久保弘道（1863-1930）提倡「武道」有別於「武術」，「武術」純為戰鬥應用之技巧，加上武士道忠君愛國精神則為「武道」。大正八年（1919），日本文部省認可西久保弘道的說法，將「劍術」、「柔術」、「弓術」更名為「劍道」、「柔道」、「弓道」，並總稱為「武道」。參見中村民雄：《史料近代劍道史》（東京：島津書房，1985年），頁18-19。

28 「samurai」寫作「侍」、「侍る」與「samurafu」、「侯」等語彙的字源相同，意思是服侍貴人的隨從，從鎌倉時代以後便被普遍使用者是指使用弓或箭的人（弓矢取者）。

29 參見二木謙一等（編）：《日本史小百科武道》（東京：東京堂，1998年4月再版），頁74。

中國先秦以後雖有專業的世襲武人，³⁰但其地位始終不高，無法形成作為支配者的武士階級，因此也無近於日本侍道、武士道之概念。因為中國的武人不成為統治階級，也不必然有一定之文化素養，因之即使其行事規範涉及國族之大義者，也難產生如日本武道所要求的心性修煉。因此，若論中國習武者之道德規範，則或可見於傳授祕技時的擇人要點，及其用武之時機上。於此可參考者，有金、元之間，少林寺覺遠上人所立之戒約十條，其條目如下：³¹

- 一 習此技術者，以強健體魄為要旨，宜朝夕從事，不可隨意作輟。
- 二 宜深體佛門悲憫之懷，縱於技術精嫻，祇可備以自衛，切戒逞血氣之私，有好勇鬪狠之舉，犯者與違反清規同罪。
- 三 平日對待師長，宜敬謹將事，勿有違抗及傲慢之行為。
- 四 對待儕輩，須和順溫良，誠信毋欺，不得恃強凌弱，任興妄為。
- 五 於挈錫遊行之時，如與俗家相遇，宜以忍辱救世為主旨，不可輕顯技術。
- 六 凡屬少林師法，不可逞憤相較，但偶爾遭遇，未知來歷，須先以左手側掌，上與眉齊，如係同派，須以右掌照式答之，則彼此相知，當互為援助，以示同道之誼。

30 如南北朝後期，西魏的宇文泰在大統九年（543），廣泛招募各地漢族豪強地主從軍，西魏政權根據他們所帶軍隊的眾寡，授予各種不同爵位。西魏結合了鮮卑部落的兵力與漢族之封建兵制形成了「府兵制」，當時府兵與民籍分開，不屬郡縣管轄，他們只管打仗，不負擔其他賦稅。又如明代的衛所兵制，衛和所大多設在軍事要衝上，區內的人民稱為軍戶，受衛和所管轄，有當兵的義務，平時農耕、練武，有戰事時，則由朝廷遣調出兵。

31 覺遠上人之傳說，最早載於民國四年（1915），尊我齋主人著的《少林拳術秘訣》（上海：中華書局，1915年）。書中謂覺遠上人拜洪蘊禪師門下，曾推衍所學之羅漢十八手為七十二手。後與李叟、白玉峰整理少林拳術，而創增為一百七十餘手，並制定少林習武之戒律，被稱作少林拳法的「中興之祖」。金一明（編）：《中國技擊精華》（太原：山西科技出版社，2003年再版；原出版於1931年）頗質疑尊我齋主人《少林拳術秘訣》一書，謂：「尊我齋主人，謂有洪蘊禪師，覺遠上人，秋月禪師。覺遠傳於一貫禪師。一貫傳於黔之胡氏、粵之蔡九儀，他如澄隱上人〔……〕然洪蘊禪師與澄隱上人之事跡，余尚未見載於何書。」郭希汾（即郭紹虞）（編）：《中國體育史》（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民國叢書》第一編，50），列覺遠上人為正史人物。其書第四編第四章列有「覺遠上人之拳術」一節，論其生平及戒約，見頁33-35。

- 七 飲酒食肉，為佛門之大戒，宜敬謹遵守，不可違犯，蓋以酒能奪志，肉可昏神也。
- 八 女色男風，犯之必遭天譴，亦為佛門之所難容，凡吾禪宗弟子，宜垂為尚戒忽忽。
- 九 凡俗家子弟，不可輕以技術相授，以免貽害於世，違佛氏之本旨，如深知其人性情純良，而又無強悍暴狠之行習者，始可一傳衣鉢，但飲酒淫慾之戒，須使其人誓為謹守，勿得以一時之興會，而遽信其畢生，此吾宗之第一要義。幸勿輕忽視之也。
- 十 戒恃強爭勝之心，及貪得自誇之習，世之以此自喪其身而兼流毒於人者，不知風幾，蓋以技擊術之於人，其關係至為緊要，或炫技於一時，或矜得於富室，因之生意外之波瀾，為禪門之敗類，貽羞當世，取禍俄頃，是豈先師創立此術之意也乎。凡在後學，宜切記之。

上十條所列雖有道德之意義，但只能作為一門一派或習武者之規範，不足為士人特有之風範。且在中國文化中，士人對於武士多未給予特殊的尊崇，認為技擊僅敵一人，不可為敵萬人之大道，如《荀子·議兵》即言：「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荀子的說法廣為儒者所重視，如理學家程伊川（頤，1033-1107）即有言：「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挺以撻秦、楚之兵矣。」³²因之，自漢代獨尊儒術以來，士人多不習武，士人習武特盛者，只在於標舉反清復明大業的明末清初。³³

32 見《二程遺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儒家類」第698冊），卷6，頁8b / 698-73下。又，清初張能麟（編）：《儒宗理要》（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據天津圖書館藏清順治15年刻本影印，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儒家類」第21冊），〈二程子卷6·遺書外書·諸子百家類〉，頁21b / 21-245下。

33 郭希汾（編）《中國體育史》言：「明社既屋，一般忠烈遺民，與夫宗社故老，常歸規復山河之志，懼筋肉之廢弛，因磨鍊以自勉。船山《讀通鑑論》、《宋論》、《黃書》、《噩夢》諸作，痛歎於黃族文弱之病，其傷心如見也。當時顧、黃、顏諸先生，道義、文章為世所重，而復精擅技擊，則亦明代拳藝發達之故也。」見頁42-43。

明末清初之士人習武，如顧亭林（炎武，1613-1682）、黃宗羲（1610-1695）、顏習齋（元，1635-1704）等，事雖不見明確，然亦有跡可察。如顧亭林自述曾被叛逃之三世僕陸恩誣告通海狀，因而急擒陸恩且將之沉死江中，此可見顧亭林的豪俠之氣與膂力技擊皆有過人之處。³⁴又如顏習齋，傳言其「嘗削竹刀，以勝劍客」、「日與其徒肄於射圃，終身不衰。其學專標忍嗜欲、苦筋力之旨為學道不二法門」，凡此可知其尚武且有造詣。³⁵大儒黃宗羲世傳也有驚人武藝，十九歲時曾為報父仇，袖長錐殺崔應元諸人；³⁶又拳術中分「內家」、「外家」之說，及武當張三峯之拳術傳承，也始見於黃宗羲《南雷文集·王征南墓誌銘》，黃氏以前，如戚繼光、程冲

34 《亭林詩集》卷2〈贈路光祿太平〉下有序言：「已下數首皆余蒙難之作。先是有僕陸恩服事余家三世矣，見門祚日微，叛而投里豪。余持之急，乃欲陷余重案。余聞，亟擒之，數其罪，沉諸水。其婿復投豪，訟之郡，行千金求殺余。余既待訊，法當囚繫，乃不之獄曹而執諸豪奴之家。同人不平為代愬之，兵備使者移獄松江府以殺奴論。豪計不行，而余有戒心，乃浩然有山東之行矣。」參顧炎武：《亭林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刻本影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1402冊），頁16b-17a/25下-26上。其事又可見於〔清〕全祖望（1705-1755）：《鮚埼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據清嘉慶九年史夢蛟刻本影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1429冊），卷12，〈碑銘·亭林先生神道表〉，頁3b-4a/56-57；〔清〕徐燾（1810-1862）：《小腆紀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據清光緒十三年金陵刻本影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別史類」第333冊），卷53，〈列傳46·儒林一·顧炎武〉，頁1a-5a/121下-123下。

35 近人黃鴻壽《清史紀事本末》言顏習齋：「有勇畧、善射，常折竹為刀，以勝劍客，罄控馳射中六的。日與其徒肄於射圃，終身不衰。其學專標忍嗜欲、苦筋力之旨為學道不二法門。其著述往往嘆息於宋之亡，才士摧折，不盡其用，其志可知已。」見黃鴻壽：《清史紀事本末》（臺北：三民書局，1959年），卷22，〈諸儒出處學問之概〉，頁2a-2b/161-162。又章炳麟《尙書·顏學第十一》言：「兵、農、水、火、錢、穀、工、虞無不閑習，輔世則小大可用，不用而氣志亦日以槩駟，安用冥求哉！觀其折竹為刀，以勝劍客，罄控馳射，中六的也，當明室顛覆，東胡入帝而不仕宦，蓋不忘乎光復者。藉在輓近，則騎帆而動櫓也，故曰：勇達德也。又數數疚心于宋氏之亡，儒生、耆老，痛摧折才士，而不用其尚武，則義之所激已，然外勅九容九思，持之一跬步而不敢墮。」見章炳麟：《尙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據浙江省圖書館藏清光緒三十一年日本印本影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儒家類」第953冊），頁583。

36 其事略言：「公年十九，袖長錐、草疏入京頌寃，至則逆奄已磔。有詔，死奄難者贈官三品，予祭葬祖父如所贈官蔭子。公既謝恩，即疏請誅曹欽程、李實忠端之荆籍。由欽程奉奄旨論劾，李實則成丙寅之禍者也，得旨刑部作逮究問，五月會訊。許顯純、崔應元公對簿出所，袖錐錐顯純，流血蔽體，顯純自訴為孝定皇后外甥，律有議親之條。公謂：顯純與奄構難忠良，盡死其手，當與謀逆同科。夫謀逆則以親王高煦尚不免誅，況皇后之外親？卒論二人斬。」見於《鮚埼亭集》，卷11，〈碑銘·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頁2a-2b/48。

鬥等，皆無內、外家之說。³⁷不僅黃宗羲精於技擊，其子黃百家（1643-1709）亦從王征南（1617-1669）學，著有《內家拳法》。³⁸

清初之復明大業關乎民族大義，不但使士人一改文弱之風而趨於尚武，也使得武人的道德規訓脫離門派與地域之區限。如反清之祕密活動多遁跡佛寺，而以少林為多，當時少林寺有痛禪上人者（本名朱德疇，相傳為明代福王之堂叔）因在廣西舉事不成、海渡至臺灣事亦無功，³⁹乃還至少林授徒，立戒約十條如下：⁴⁰

- 一 肄習少林技擊術者，必須以恢復中國為志意，朝夕勤修，無或稍懈。
- 二 每日晨興，必須至明祖前行禮叩禱，而後練習技術，至晚歸寢時亦如之，不得間斷。

37 《南雷文定前集·王征南墓誌銘》言：「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於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所謂內家者，以靜制動犯者，應手即仆，故別少林為外家。蓋起於宋之張三峯。三峯為武當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得進，夜夢玄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單丁殺賊百餘。三峯之術百年以後流傳於陝西，而王宗為最著，溫州陳州同從王宗受之，以此教其鄉人，由是流傳於溫州。嘉靖間張松溪為最著，松溪之徒三四人而四明葉繼美近泉為之魁，由是流傳於四明，四明得近泉之傳者為吳崑山、周雲泉、單思南、陳貞石、孫繼槎，皆各有授受。崑山傳李天目、徐岱嶽；天目傳余波仲、吳七郎、陳茂弘；雲泉傳盧紹岐；貞石傳董扶輿、夏枝溪；繼槎傳柴玄明、姚石門、僧耳、僧尾；而思南之傳則為王征南。思南從征關白，歸老於家，以其術教授，然精微所在則亦深自秘惜，掩關而理，學子皆不得見。征南從樓上穴板窺之得梗槩，思南子不肖，思南自傷身後莫之經紀。征南聞之，以銀厄數器奉為美饋之資，思南感其意，始盡以不傳者傳之。」見黃宗羲：《南雷文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七年靳治荊刻本影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第1397冊），卷8，頁11/350上。內家拳名家張松溪事又見於《明史》，卷397，〈方技傳上〉。

38 《內家拳法》開首言：「自外家至少林其術精矣，張三峯既精於少林，復從而讎之，是名內家，得其一二者，已足勝少林。王征南先生從學於單思南而獨得其全，余少不習科舉業，喜事，甚聞先生名，因裹糧至寶幢學焉，先生亦自絕，憐其技授受甚難，其人亦樂得余而傳之。」見黃百家：《內家拳法》（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據《昭代叢書》世楷堂藏板影印，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子部」），頁1a-1b/201上。

39 有關痛禪上人之事參見郭希汾（編）：《中國體育史》，第9章，〈清初技擊家之苦心孤詣〉；以及王寒生：〈中國武道道統概要〉，收入《中國武術史料集刊》（臺北：教育部體育司，1975年），第2集，頁13-15。王寒生敘及：「（痛禪上人）清順治年間來臺，未獲鄭經奉朔供奉，決志隱老淡水河上，以授徒終其身，是為本省有正式傳少林武藝之來源。」

40 見郭希汾（編）：《中國體育史》，第9章，頁43-44。

- 三 少林技術之馬步，如演習時，以退後三步，再前進三步，名為踏中宮，以示不忘中國之意。
- 四 凡屬少林宗派，宜至誠親愛，如兄弟手足之互相救助，互相砥礪，違此者即以反教論罰之。
- 五 凡少林派之演習拳械時，宜先舉手作禮，惟與他家異者，他家則左掌而右拳，拱手齊眉，吾宗則兩手作虎爪式，以手背相靠，平與胸齊，用示反背胡族，心在中國。
- 六 如在遊行時，遇有必相較量者，先舉手作如上式之禮，倘是同派，必相與和好，若係外家，既不知此，則相機而動，量其技術之深淺，作以身軀之防護，非到萬不獲已時，不可輕擊其要害。
- 七 傳授門徒，宜慎重選擇，如確係樸厚忠義之士，始可以技術相傳，惟自己平生之得力專門手法，非相習久而相知最深者，不可輕於相授，至吾宗之主旨，更宜擇人而語，切勿忽視。
- 八 恢復河山之志，為吾宗之主旨，倘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如不知此者，謂之少林外家。
- 九 濟危扶傾，忍辱度世，吾族既皈依佛門，自當仍以慈悲為主，不可有逞強凌弱之舉。
- 十 尊師重道，敬長友愛，除貪祛妄，戒淫忌狠，有於此而不謹為遵守者，當與眾共罰之。

痛禪上人與前述覺遠上人的約戒相較，明顯有異者為「恢復河山之志，為吾宗之主旨」一條。然此為明末時空下的產物，不足為習武者恆久之規範。因此若論中國近代武士道之概念，黃百家的《內家拳法》實露其端，可以四點說明之：一、此書述及「心險者、好鬪者、狂酒者、輕露者、骨柔質鈍者」等五者不可傳其技，可謂論及習武者的心性素質與道德修養，與上述二則十戒條有相同之處。二、此書論及拳法的精要心訣，非僅止於拳譜之演布及形架之說明，可謂涉及技藝本身之道的意義。⁴¹三、此書論及

41 《內家拳法》言：「甬東先生入城時，嘗過余齋談及武藝事，猶為余諄諄愷切曰：『拳不在多，惟在熟鍊之純熟，即六路亦用之不窮，其中分陰陽，止十八法而變出即有四十

拳法即槍、刀、劍、鉞之法，認為「卒伍之步伐，陣壘之規模」俱存其中，⁴²可見在其概念中，拳法非止於拳術或武藝，而有將「武藝」延伸為「道」的意義。四、此書反對士人空談理念，認為「伊吾於城門晝閉之中」、「命一二守望相助等題以為平盜之政」、「撫拾一二兵農合一之語以為經濟之才」等皆不可取，主張「天下事必非齷齪拘儒之所任」，其倡導士人必須文武兼備方能有用於世的說法，實有武人與士人合一的「武之士」、「士之武」的意義。⁴³

然而，黃百家的論述最後也淹沒在「科舉之文」、「經生業」中。隨著反清復明大業的落幕，清儒之中雖傳說有技勇名家，如陸桴亭（1611-1672）、⁴⁴許子遜、⁴⁵羅臺山（1733-1778）、⁴⁶周保緒、⁴⁷羅守仁等，⁴⁸但於武人在精神及道德上之修養，似乎未有進一步的論述與實踐。

九。』又曰：『拳如絞花槌，左右中前後皆到，不可止顧一面。』又曰：『拳亦由博而歸約，山七十二跌（即長拳滾、斫、分心十字等打法名色）三十五拿（即斫、刪、科、磕、靠等）以至十八（即六路中十八法）由十八而十二（倒、換、搓、擲、滾、脫、牽、縮、跪、坐、擗、拿）由十二而總歸之存心之五字（敬、緊、徑、勁、切），故精於拳者，所記止有數字。』」頁4b-5a / 202下-203上。

42 《內家拳法》言：「先生談古道今，意氣忼慨，因為余兼及槍刀劍鉞之法。曰：『拳成，外此不難矣，某某處即槍法也，某某處即劍鉞法也，以至卒伍之步伐，陣壘之規模，莫不淋漓傾倒。』」頁4a-4a / 202下。

43 《內家拳法》言：「（先生）曰：『我無傳人我將盡授之子。』余時鼻端出火，興致方騰，慕睢陽伯紀之為人，謂天下事必非齷齪拘儒之所任，必其能上馬殺敵，下馬擒王，始不負七尺於世。〔……〕今先生之死止七年，吾鄉盜賊亦相蟻合，流離載道白骨蔽野，此時得一桑梓足以除之，而二三士子猶伊吾於城門晝閉之中，當事者命一二守望相助等題以為平盜之政，士子撫拾一二兵農合一之語以為經濟之才，龍門子〈秦士錄〉曰：『使弼在，必當有以自見。』言念先生竟空槁三尺蒿下，寧不惜哉！嗟乎先生不可作矣，念當日得先生之學，即豈敢謂遂有關於匡王定霸之略，然而一障一堡或如范長生樊雅等護保黨閥，自審諒庶幾焉，亦何至播徙海濱，擔簦四顧，望塵起而無遯所如今日乎？』」頁5a-5b / 203上。

44 徐珂（1869-1928）《清稗類鈔·技勇類·陸桴亭梅花鎗法》條言：「太倉陸桴亭深曉兵律，通武藝，其梅花鎗法為峨嵋山僧指授。」見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6冊，頁2865。

45 《清稗類鈔·技勇類·許子遜髮辮上指》言：「康熙時，王文簡公（王阮亭）有詩弟子許子遜，由進士官福建知縣。雖文士，絕擅拳勇。嘗補武平令，縣境與粵東某縣毗連，兩縣民以爭山地械鬪，許馳赴填戰，粵民殊獷悍，羣起毆扶許，則敗，皆警服，弗敢肆。」見頁2871。

46 《清稗類鈔·技勇類》有〈羅臺山徒手禦捕〉及〈羅臺山以石擊舟子〉條。見頁2899-2900。

肆、妨礙武士道精神的文化因素

近代中國武士道所以未能在現實上生根，除了上節所論缺乏傳統的武人規範之道以及文武合一的教育外，還存在著不利於武士道發展的文化因素，這些因素雖不見於梁啟超所著的《中國之武士道》一書，但可略於書前楊度（1874-1931；原名承瓚，字哲子，後改名度，別號虎公、虎禪，又號虎禪師、虎頭陀、釋虎）及蔣智由（1866-1929；原名國亮，字觀雲、星儕、心齋，號因明子）的〈序〉、〈敘〉之中。

梁啟超雖然苦心孤詣，掘發中國尚武之傳統，標舉秦、漢以來「我先民之武德，足為子孫模範」者之事蹟，而列出如下十八條之武德典範：

- 一 常以國家名譽為重，有損於國家名譽者，刻不能忍。
- 二 國際交涉，有損於國家權利者，以死生爭之，不畏強禦。
- 三 苟殺身而有益於國家者，必趨死無吝無畏。
- 四 己身之名譽，或為他人所侵損輕蔑，則刻不能忍，然不肯為短見之自裁，不肯為懷忿之報復，務死於國事，以恢復武士之譽。

47 《清稗類鈔·技勇類·周保緒習易筋經卷簾術》言：「荊谿周保緒教授濟，嘉慶乙丑進士，為淮安府教授。少工詞章，與張翰風、李申者善。又習易筋經、卷簾諸術，拳勇技擊一時無兩。」見頁2913。「官淮安日，與漕督周文忠公天爵、知府周聽松燾並以勇力聞，號淮有三洲，以洲之音同於周也。城守營參將某以勦川、陝教匪立功，自矜武力，周曰：『姑至敝署一較，何如？』翌日往，共賭躍大成殿，周十上十下，如飛鳥濯翼，超過簷際，某僅得其六，微側，遽墮，折其右足，醫數月，卒跛而行。」見頁2913-2914。

48 《清稗類鈔·技勇類·羅家三展之拳》條言：「羅守仁湛古學，困於場屋，改習拳。年四十，因事如廣西，至梧州，宿古寺。遇一僧，年耄矣，尚矍鑠，與語甚洽，因及技擊，言時頗露矜色。僧請一試，羅遂起舞。僧斜睨，微笑曰：『美則美矣，然不能勝老僧也。』因起作勢，使羅扑之。羅旋舞而進，僧揮以手，羅退盈丈而顛。笑曰：『何如？』羅知技未進，請執弟子禮，凡三年，學成而歸，設館於羊城以授徒。」見頁2923。「及晚年，乃綜所學，擇尤者演為七十二首，每首凡三變，名曰三展。而學者每苦其難，至三十六首輒止，未能概盡其妙。後其技仍見稱於人，號曰羅家三展。」同上。

- 五 對於所尊長，常忠實服從，雖然，苟其舉動有損於國家大計或名譽者，雖出自所尊長，亦常抗責之不肯假借，事定之後，亦不肯自寬其犯上之罪，而常以身殉之。
- 六 有罪不逃刑。
- 七 居是職也，必忠其職，常犧牲其身乃至犧牲其一切所愛以殉職。
- 八 受人之恩者，以死報之。
- 九 朋友有急難以相托者，常犧牲其生命及一切利益以救之。
- 十 他人之急難，雖或無與於我，無求於我，然認為大義所在，大局所關者，則亦銳身自任之，而事成不居其功。
- 十一 與人共事，而一死可以保秘密，助其事之創立者，必趨死無吝無畏。
- 十二 死不累他人。
- 十三 死以成人之名。
- 十四 戰敗，寧死不為俘。
- 十五 其所尊親者死，則與俱死。
- 十六 其所遇之地位，若進退維谷。不能兩全者，則擇其尤合於義者為之，然事過之後必以身殉，以明其不得已。
- 十七 其初志在必死以圖一事者，至事過境遷以後，無論其事或成或不成，而必殉之，以無負其志。
- 十八 一舉一動，務使可以為萬世法則，毋令後人誤學我以滋流弊。⁴⁹

著眼於國民精神之改革，上述十八條在內容上「要而論之，則國家重於生命，朋友重於生命，職守重於生命，然諾重於生命，恩仇重於生命，名譽重於生命，道義重於生命」；而其表現之人物有聖人孔子、君主太子、將相謀士、地方官員，也有陪臣士兵、僕人、民婦、漁夫、屠戶等，具有社會組成分子的普遍性，可代表「我先民腦識中最高尚純粹之理想，而當時社會上普通之習性」。⁵⁰梁啟超的論述看似完整，然而這樣的論點若放在

49 見《中國之武士道·自敘》，頁19-20。

50 見《中國之武士道·自敘》，頁20。

「自漢代的景、武之間，此普通習性已經漸滅以盡矣」的前提下，⁵¹則顯露其議論上的不足。亦即：梁啟超似乎未能思考「歷史的斷裂若不經國民長期的反省，其理分及文化如何修復？」之問題。

在〈凡例〉中，梁啟超言：「本編敘次，一依年代，惟以孔子為二千年來全國思想之中心點，故遙冠諸首，以資信仰。」其冠孔子於篇首、舉孔子語為號召，⁵²雖能尊本溯源於儒家「勇之達德」與「知恥近乎勇」之意，而借勢於中國之主流文化，然其論述並未明察當時民間武術之發展，實多受道教養生思想的影響。相較於梁啟超，楊度在《中國之武士道》的〈敘〉文中，對道家文化或楊朱文化與中國人的關係，則有銳利的觀察。

楊度深知日本的武士道的興起，與其在學術文化上能融合儒教、釋教及陽明學之精義有關，⁵³因而能看破中國武士道之不立，源於楊朱之教為中國深層文化之故，其言曰：

（中、日武士道）一則古微而今盛，一則古有而今無，現象之相反如此，此其故何哉？梁氏之論中國也，曰：「專制政體之故。」楊度曰：「豈獨政治，蓋亦學術之異，有以使之然者矣。〔……〕無如自漢以來，所謂尊從儒教者，不過表面上欺人之詞，而其實則所行者非儒教而楊朱之教也。〔……〕則凡孔教之徒既不能以佛教之理瞭解生死問題，而惟於現世之中，日用尋常之事，兢兢業業，惟恐失墜，則必遇事遇物皆為一身苦惱之緣，於是楊朱之說得以乘間

51 《中國之武士道·自敘》言：「我民族武德之斫喪，則自統一專制政體之行始矣。統一專制政體，務在使天下皆弱，惟一人獨強，然後志乃得逞，故曰『一人為剛，萬夫為柔』，此必至之符也，作俑者為秦始皇〔……〕次摧之者則漢高祖〔……〕次則景、武之間〔……〕至是，而尚武精神，漸滅以盡矣。」見頁20-21。

52 《中國之武士道·自敘》言：「今者愛國之士，莫不知獎厲尚武精神之為急務，雖然，孔子不云乎：我欲見諸空言，不如徵之行事之博深切明。又曰：『無微弗信，弗信民弗從。』」又曰：『吾舍魯奚適矣。』」見頁23。

53 《中國之武士道·楊敘》言：「日本學之，則反能得二者（儒教、釋教）之長，而相輔相成，以了人生之義務，故其人於成仁取義之大節，類能了達生死，損軀致命以赴之。〔……〕而儒教之中，於孔、孟之後獨宗陽明，更以知行合一之說，策其以身殉道之情，此又於儒術派別之宗，亦有以異於我國。擇術既異，收效自殊，此皆其武士道成立之原素。」見頁6-7。

抵隙，入而據之。學孔子甚苦而學楊朱則甚樂，人情莫不惡難而喜易，避苦而趨樂。〔……〕知中國為楊教之國而非儒教之國，名實相符表裡如一，則亡國之原因猶易尋其所在。」⁵⁴

楊氏之說可謂一針見血，而其所言楊朱之學，實亦可引伸為求「長視久生」的道家或神仙道教之學。針對此種風尚，以下可再舉二例以為補充。其一，民國高僧太虛（1890-1947）提倡「人生佛教」，其所謂「人生的佛教」是對傳統佛教以度死鬼（超度亡靈）為能事的「死鬼的佛教」而說的，太虛之後，印順（1906-2005）倡「人間佛教」亦是此意。⁵⁵「死鬼的佛教」反映清代以來佛教的發展狀況，亦可知佛教徒所重者非就生命意義上而求「了卻生死」，而是傾向於對死後世界的安頓。這不但使得當時的僧人忙於趕經懺、作法事，也致使佛教的精神淪喪殆盡，在生死觀上逐漸與道教戀生的傾向合流。在戀生的傾向下，佛、道之間的差異，只在於前者是以「往生淨土」之說，保證死後世界可享受人間未得的福報，而後者則以「返歸先天」、「羽化成仙」擺脫死亡對生命的糾纏。

其二，中國古代之體操本有道家講究呼吸屈伸之導引術，其後演為道教內丹之神仙學，不論導引或鍊丹，其要不外乎養生長壽，甚至不死成仙。自清代以來，長生成仙不僅行於宗教，亦有逐漸滲入武術發展之趨勢，而且此種現象不僅見於內家拳術，即使外家拳術亦不免此一風氣。以內家拳術而言，養生原為拳法之精要，⁵⁶內家拳雖不以養生而廢技擊，但在民國之後，其發展不復有黃百家所言「得其一二者，已足勝少林」之氣勢，習內家拳特別是太極拳者，亦多以養生為其主要目的。外家拳術之講究養生，如民國時期負有盛名的武術家萬籟聲（原名萬常青，1903-1992）⁵⁷

54 見《中國之武士道·楊敘》，頁5-9。

55 參印順：〈人間佛教緒言〉，《妙雲集》（新竹：正聞出版社，2003年二刷），第14冊，頁18-22。

56 如託名於張三丰的〈太極拳論〉其後即有「原註云：此係武當張三丰祖師遺論。欲天下豪傑延年益壽，不徒作技藝之末也」之語。

57 萬籟聲曾拜杜心五、精於滄洲六合拳與螻螂手之趙鑫洲、擅羅漢拳之劉百川、形意拳王錦齋、通背拳王榮標、少林拳楊畏之等為師，於行意、八卦、太極、猴拳、劈卦、羅漢、南拳和槍棍等器械、無一不通。一九二八年二十五歲時曾至南京參加武術國考，後為廣東省主席李濟琛聘為廣州兩廣國術館館長。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期

於其一九二九年在商務印書館所編著《武術匯宗》的〈編輯大意〉中，即言：

本篇分上、中、下三篇，凡七章。上篇自少林功夫述起〔……〕中篇為器械學〔……〕下篇為內功。武術上內功，述及參禪入道，是為本書之歸宿。所解自然門內功，非外間所有，故不敢指一切內功皆如本門練法。而靜坐工夫，尤與現行出版靜坐書籍相刺謬。人講調節、正呼吸，余卻廢之；人講行功二三月後，即可腹中雷鳴，年餘出一大汗而愈，夙疾頓除；余則講真正功夫，緩緩從事，功到病自除；人講十六步成仙，余則先習工夫，卻疾延年，更不諳其成仙有若干步驟。誠不敢以所不知者相矇蔽，以所未經驗者相號召，則誤人誤己，實非淺鮮。最後所談之道法、神功、道術研究、經呪等等，乃所以補內家不足；也附錄跌打治法等等，又所以補內外家不足者也。⁵⁸

由上段「人講」及「余則如何」的對照語中，可知武術界之言內功而多有「腹中雷鳴、卻疾延年、成仙」之說者。萬籟聲雖然不能苟同，但書中也有「道法」、「神功」、「道術研究」等三章，並附有「輔道緊要經呪」一節。書後所列各師肖像及小傳亦註明：「外功師傅」（趙鑫洲）、「內功兼道功師傅」（杜心五）、「藥功兼武功師傅」（楊畏之）、「道功師傅」（鄧芷靈、王顯齋）、「接骨手術師傅」（王榮標）、「因又教我師也，補足武功、道功、藥功」（劉老師祖）者。其中〈劉老師祖小傳〉言：「劉老師祖不知何許人，自諱其年，鶴髮丹顏，視之似八九十老叟，而精神矍鑠，體態有如嬰兒〔……〕詢其年，則曰五旬也。曰：『然則洪楊之亂，先生何作耶？』曰：『余乃行醫』，並道當時情事甚悉。曾有陳君三代人，皆見師祖亦如今日狀。」可見當時武術界與道教風氣頗有掛鉤。

間，萬籟聲得杜心五支持，先後任重慶中央訓練團武術總教官、湖南國術訓練所所長、廣西大學體育部主任、永安體育師範學校校長、福建省體育學院教授等職。

58 萬籟聲：《武術匯宗》（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據商務印書館1929年版影印，收入《民國叢書》第一編，50）。

萬籟聲《武術匯宗》雖有〈武術對於立國之重要〉一節，論及「一人習武可以保身；一家習武可以強族」、「日之所以勝俄者，即自我國傳去柔術之功也」，⁵⁹但其〈武術真意義〉一節卻只將練武的真義定於「強健身體，卻疾延年」而已。此應非萬籟聲一人之現象，而為普遍之現象。

以上二例，說明清代以來，不論是「死鬼之佛教」之求死後安樂，或道教的「養生延年」，其背後皆有楊朱戀生之傾向。有此傾向，即不能悟楊度所言：「死者實人生最難之問題」、「苟非其人之理想能超然於死生之外，則必不能輕棄其身而欲人知此身之輕而可棄」。⁶⁰如此，求其有所謂武士道「輕死尚俠，以謀國家社會之福利」，實無徑可由。

伍、結語

若論日本武士道的守則，大部分的武士會以「不怕死」或「死的覺悟」答之。而僅就一「不怕死」亦可追究武士道的形成因素，如武士依其職業身分的自我定位、武士對身後榮譽與利益的考量、武士階級成員間的相互影響，及自我淬鍊的思想擇取等。在身分的自我定位上，武士既是「戰士」，則「膽怯」與「懦弱」為其忌諱，而以「在主君眼前戰死」為最高原則；即使不是在戰時而死，他們亦自覺是與百姓、町人不同的支配者，因而無法忍受與其他身分階級者遭受同樣的刑罰，這也是得武士的死法所以必須立異於一般庶民之緣故。在身後榮譽與利益的考量上，武士如光榮戰死或勇敢赴死，不但可作為典範被傳誦，其子孫及近系血親不但可繼承家業，而且俸祿也會因此增加。除此之外，武士在精神的養成上，應有多種管道，如：一、在成長過程中與周遭武士在行事規約上的相互影響。二、擇取當時思潮中有合於武士之用者，如儒教、佛教與神道教信仰。三、擇取軍事學家或武士之著作所表現的行事風範或哲學思想，如小幡景憲（1572-1663）依據武田信玄之兵法所集成的《甲陽軍鑑》、彙集軍

59 見萬籟聲：《武術匯宗》，頁5。

60 見梁啟超：《中國之武士道》，頁9。

事及儒學家山鹿素行(1622-1685)語錄而成的《山鹿語類》、大道寺友山(1639-1730)的《武道初心集》，以及重視武士心性修養之柳生宗矩(1571-1646)的《兵法家傳書》，以及宮本武藏(1584-1645)的《五輪書》等。

對照上述所言產生日本武士道的文化資源，則可知中國多不具備類似的文化條件。中國不但沒有文武兼備的武士階級，也缺乏由武人相互自律所形成的規範傳統，更何況又有戀生享樂的楊朱思想為其底層文化。無怪乎梁啟超橫移日本的武士道，在中國最後僅形成「體育強種」及「恢復尚武天性以競爭於列強」之論說而已，不能真正達成改造國民性格的目的。

在二十一世紀，李登輝重提武士道精神對於振興國家的重要性，主要應是著眼於武士道文化已經潛藏於日本一般國民的性格之中，⁶¹雖然其意見被懷疑是二次世界大戰日本軍國主義的復辟，⁶²但其對武士道文化的洞識應無可疑。比較有趣的是李登輝不但要用武士道喚醒日本，也認為臺灣人必須培養類似日本武士道的精神。臺灣人何以必須學習日本武士道？是基於曾經作為日本人之李登輝的日本情結？還是基於他對中國文化的看法？這或許是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61 雖然大部分武士階級在廢藩置縣之後，被剝奪了世襲的俸祿，但由於在社會上具有知識與技術的優勢，使得他們在「文明開化，普及教育」的政策下，可以順利轉向教育事業，繼續武士道精神與武道技術的傳承。如明治十六年(1883)日本中等教師有百分之七十三、小學校教師有百分之四十為士族出身。在政治階層上，明治十三年(1880)中央、地方官吏有百分之七十四為士族；明治二十三年(1890)第一次眾議員選舉，三百名眾議員中，士族亦佔了一百零九名；如再加上貴族院的議員，就可看出封建體制下的舊有統治階級，仍佔有相當優越的政治地位。就此二方面，即可想見武士道如何進入基層的國民性格之中。上述數據可參見陳水逢：《日本文明開化史略》(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0年修訂版三刷)，頁348-349。

62 日本軍國主義之教育多灌輸「忠君愛國」的武士道精神，以昭和十二年(1937)《小學生、中等學生劍道讀本》為例，第一章「總說」第一課，課目「少年劍道教習綱領」中，即提出下列五點教條：1.皇國少年以忠君愛國為主旨；2.皇國少年是呈現質實剛健的氣質；3.皇國少年是重視名譽廉恥的；4.皇國少年是守禮儀規律的。參見馬場豐二：《小學生、中等學生劍道讀本》(東京、大阪：田中宋榮堂，1937年)，頁1。

◆ 責任編輯：陳靜芳。

引用書目

古代文獻

〔宋〕程顥、程頤

1983 《二程遺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儒家類」第698冊）

〔明〕黃宗羲

1995 《南雷文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七年靳治荊刻本影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第1397冊）

〔清〕全祖望

1995 《鮚埼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據清嘉慶九年史夢蛟刻本影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1429冊）

〔清〕徐珂

1986 《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清〕徐嘉

1997 《小腆紀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據清光緒十三年金陵刻本影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別史類」第333冊）

〔清〕張能鱗（編）

1995 《儒宗理要》（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據天津圖書館藏清順治15年刻本影印，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儒家類」第21冊）

〔清〕黃百家

1994 《內家拳法》（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據《昭代叢書》世楷堂藏板影印，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子部」）

〔清〕黃鴻壽

1959 《清史紀事本末》（臺北：三民書局，1959年）

〔清〕顧炎武

- 1995 《亭林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刻本影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1402冊）

近人文獻

二木謙一等（編） Futaki, Ken'ichi, etc. (eds.)

- 1998 《日本史小百科武道》（東京：東京堂，1998年4月再版）
Budō (Tokyo: Tōkyōdō Shuppan, 1998)

入江康平等 Irie, Kōhei, etc.

- 1988 《日本武道學研究：渡邊一郎教授退官記念論集》（東京：島津書房，1988年）
Nihon budōgaku kenkyū: Watanabe Ichirō Kyōju taikan kinen ronshū (Tokyo: Shimazu Shobō, 1988)

中村民雄 Nakamura, Tamio

- 1985 《史料近代劍道史》（東京：島津書房，1985年）
Shiryō kindai kendōshi (Tokyo: Shimazu Shobō, 1985)
- 1988 〈大日本武德會設立過程の研究——組織の形成と財政基盤について〉，收入入江康平等（著）《日本武道學研究：渡邊一郎教授退官記念論集》（東京：島津書房，1988年），頁409-410
"Dainihon butokukai setsuritsu katei no kenkyū: soshiki no keisei to zaisei kiban ni tsuite," in Kōhei Irie etc., *Nihon budōgaku kenkyū: Watanabe Ichirō Kyōju taikan kinen ronshū* (Tokyo: Shimazu Shobō, 1988), pp. 409-410

中華武術會（編） China Wushu Association (ed.)

- 2008 《武術月刊》，收入釋永信（編）《民國國術期刊文獻集成》（北京：中國書店，2008年），第1、2卷
Wu shu, in Yongxin Shi (ed.), *Minguo guo shu qi kan wen xian ji cheng*, vols. 1-2 (Beijing: Cathay Bookshop, 2008)

井上俊 Inoue, Shun

- 2004 《武道の誕生》（東京：吉川弘文館，2004年）
Budō no tanjō (Tokyo: Yoshikawa Kōbunkan, 2004)

井上哲次郎、有馬祐政（編） Inoue, Tetsujirō and Arima, Sukemasa (eds.)

- 1905 《武士道叢書》（東京：博文館，1905年）
Bushidō sōsho (Tokyo: Hakubunkan, 1905)

王美琇 Wang, Michelle

- 2004 〈遇見李登輝的「武士道」〉，《海峽評論》，第168期（臺北：海峽評論雜誌社，2004年12月），頁49-50
 "Yu jian Lee Teng-hui de 'wu shi dao'," *Straits Review Monthly*, 168 (Dec., 2004), pp. 49-50

王寒生 Wang, Han-sheng

- 1975 〈中國武道道統概要〉，收入《中國武術史料集刊》（臺北：教育部體育司，1975年），第2集，頁13-15
 "Zhongguo wu dao dao tong gai yao," in *Zhongguo wu shu shi liao ji kan*, 2 (Taipei: D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MOE, 1975), pp. 13-15

印順 Yin, Shun

- 2003 《妙雲集》（新竹：正聞出版社，2003年二刷）
Miao yun ji (Hsinchu: Zheng wen chu ban she, 2003)

李登輝 Lee, Teng-hui

- 2003 《武士道解題：ノーブレス・オブリージュとは》（東京：小學館，2003年）
 "Bushidō" kaidai: nōburesu oburīju to wa (Tokyo: Shōgakkan, 2003)

昌滄 Chang, Cang

- 1997 〈南京中央國術館始末〉，《體育文史》，第4、5期（北京：國家體育總局文史工作委員會，1997年），頁38-40
 "Nanjing zhong yang guo shu guan shi mo," *The Journal of Sport History and Culture [Ti yu wen shi]*, No. 4-5 (Beijing: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 of China, 1997), pp. 38-40

林明德 Lin, Ming-de

- 1986 《日本史》（臺北：三民書局，1986年10月初版）
Ri ben shi (Taipei: San Min Book, 1986)

金一明（編） Jin, Yi-ming (ed.)

- 2003 《中國技擊精華》（太原：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年再版；原出版於1931年）
Zhong guo ji ji jing hua (Taiyuan: Shan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ublishing House, 1931, 2003)

益惠 Yi Hui

- 2008 〈兵毒〉，原載於《武術月刊》，第1卷第1期，收入釋永信（編）《民國國術期刊文獻集成》（北京：中國書店，2008年），第1卷，總頁367-372
 "Bing du," in Yongxin Shi (ed.), *Minguo guo shu qi kan wen xian ji cheng*, Vol. 1 (Beijing: Cathay Bookshop, 2008), pp. 367-372

- 財團法人全日本劍道連盟 (編) Zaidan Hojin Zen Nihon Kendo Renmei (ed.)
 2003a 《五十年史》(東京:サトウ印書館, 2003年)
Gojūnenshi (Tokyo: Sato-Inshokan, 2003)
 2003b 《劍道の歴史》(東京:朝日新聞出版, 2003年)
Kendo no rekishi (Tokyo: Asahi Shimbun Publications Inc., 2003)
- 馬場豊二 Baba, Toyoji
 1937 《小學生、中等學生劍道讀本》(東京、大阪:田中宋榮堂, 1937年)
Shōgakusei chūtō gakusei kendō-dokuhon (Tokyo; Osaka: Tanaka Sōeidō, 1937)
- 高野佐三郎、高野弘正 Takano, Sasaburo and Takano, Hiromasa
 1937 《小學劍道指導書》(東京、大阪:東洋圖書, 1937年)
Shōgaku kendo shidoōho (Tokyo; Osaka: Tōyō Tosho, 1937)
- 梁啟超 Liang, Qichao [Liang, Chi-chao]
 1957 《中國之武士道》(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1957年)
Zhongguo zhi wu shi dao (Taipei: Chung Hwa Book Company, Ltd., 1957)
- 郭希汾(郭紹虞)(編) Guo, Shao-yu (ed.)
 1989 《中國體育史》(上海:上海書店, 1989年,《民國叢書》第一編, 50)
Zhongguo ti yu shi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1989)
- 陳水逢 Chen, Shui-feng
 2000 《日本文明開化史略》(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2000年修訂版三刷)
Ri ben wen ming kai hua shi lue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2000)
- 陳伯璋 Chen, Bo-chang
 1993 《意識型態與教育》(臺北:師大書苑, 1993年)
Yi shi xing tai yu jiao yu (Taipei: Shtabook, 1993)
- 陳義隆 Chen, I-lung
 2008 《日治時期臺灣武道活動之研究》(中壢: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8年)
The Study of the Budo (Japanese martial art) Activities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zation Era,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2008)

陳鐵生 Chen, Tie-sheng

- 2008 《精武本紀》，收入釋永信（編）《民國國術期刊文獻集成》（北京：中國書店，2008年），第1卷
Jing wu ben ji, in Yongxin Shi (ed.), *Minguo guo shu qi kan wen xian ji cheng*, Vol. 1 (Beijing: Cathay Bookshop, 2008)

章炳麟 Zhang, Bing-lin

- 1997 《尙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據浙江省圖書館藏清光緒三十一年日本印本影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儒家類」第953冊）
Qiu shu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97)

尊我齋主人 Zunwozhaizhuren

- 1915 《少林拳術秘訣》（上海：中華書局，1915年）
Shao lin quan shu mi jue (Shanghai: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15)

渡邊一郎 Watanabe, Ichiro

- 1981 《武道論》（東京：筑波大學體育學系，1981年）
Budō ron (Tokyo: Dept. of Health,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Sciences, University of Tsukuba, 1981)

渡邊一郎（編） Watanabe, Ichiro (ed.)

- 1971 《史料明治武道史》（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71年3月）
Shiryō Meiji budōshi (Tokyo: Shin Jinbutsu Ōraisha, 1971)

新渡戶稻造 Nitobe, Inazo

- 2003 《武士道：影響日本最深的力量》，吳容宸（譯）（臺北：先覺出版社，2003年）
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 [Wu shi dao: ying xiang Riben zui shen de li liang], Rong-chen Wu (trans.) (Taipei: Xian jue chu ban she, 2003)

萬籟聲 Wan, Lai-sheng

- 1989 《武術匯宗》（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據商務印書館1929年版影印，收入《民國叢書》第一編，50）
Wu shu hui zong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1989)

臺灣日日新報社 Taiwan ri ri xin bao she

- 1907 〈臺南之招待武德會長〉，《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6月4日
 "Tainan zhi zhao dai wu de hui zhang," *Taiwan ri ri xin bao*, June 4, 1907

劉德安 (阿修伯) Liu, Teh-an (Axiubo)

- 2004 〈慶祝終戰武士道復興在臺灣〉，《海峽評論》，第168期
(臺北：海峽評論雜誌社，2004年12月)，頁46-47
"Qing zhu zhong zhan wu shi dao fu xing zai Taiwan," *Straits
Review Monthly*, 168 (Dec., 2004), pp. 46-47

諸橋徹次 (編) Murohashi, Tetsuji (ed.)

- 1960 《大漢和辭典》(東京：大修館，1960年)
The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China and Japan [Dai kan wa ziden]
(Tokyo: Taishūkan, 1960)

藤原正彥 Fujiwara, Masahiko

- 2005 《國家の品格》(東京：新潮社，2005年)
Kokka no hinkaku (Tokyo: Shinchōsha, 2005)